

香港發展速度為何放緩？

□周八駿

香港大型基礎建設速度大大落後於內地，部分原因是反對派竭力阻撓，他們一再骨頭中挑刺，設置障礙。然而，倘若特區政府改善民生能有可觀成績，那麼，反對派就少了一項煽動群眾反對或阻撓有關工程的藉口。

知微篇

2011年12月26日，廣深港高鐵廣深段正式開通營運，不能不使人聯想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建造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設想，不是廣東省單方面所提議，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從開始就參與。2001年10月，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上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向國家委員會提出建造穗港磁懸浮鐵路詳細計劃。2002年2月，在「內地與香港特區大型基建協作會議」框架下，特區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與國家鐵道部共同成立「廣深港高速鐵路規劃小組」。2004年1月7日，國務院審議通過中國第一份《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決定建設逾1.2萬公里「四縱四橫」客運專線，將香港納入此規劃。

香港基建落後於人

從此，廣深港高鐵的廣深段和香港段的命運便明顯不一樣了。前者規劃進度加快，2004年7月基本接近尾聲。2004年12月30日，為配合武廣客運專線的整體進度，新廣州站率先動工。2005年9月，國家發改委正式批覆《廣深港鐵路客運專線廣州至深圳段可行性研究報告》。2005年12月18日，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段正式動工興建。

反對派處處設障礙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建造落後四年主要影響香港，因為，鐵路可以分段建成分段通車。港珠澳大橋則不同，不可能先建成連接珠海和澳門的一段懸在半空之中，等待香港部分建完了接上，所以，香港部分建設必須爭分奪秒。

筆者寫這則評論，不是與讀者討論以上兩大連接香港與內地基建工程的進展情況，而是要與大家一起思考為什麼香港方面一再拖延有關工程進度？結合香港本地大型建設項目例如西九文化區一波三折的坎坷，我們必須思考和回答一個重要問題：香港發展速度為何放緩？

在二次大戰以來的幾十年間，香港一直是如此地蹉跎，那麼，「東方明珠」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輝煌是不可能

造就的。比較香港的「昨天」，有人也許以為「今日」香港正是離開了港英管治而顯得無能。然而，最近七年「蕭規曹隨」不已戳穿了這樣的虛妄之想。

反對派則一味地鼓噪是因為沒有實現普選，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難有作為。然而，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不就是兩項深獲香港大多數居民支持的工程，它們的香港部分建造之所以都受阻不正是因為反對派竭力反對和阻撓？

毋需諱言，近十多年來香港發展之所以放緩，在很大程度上與反對派的政治立場相關聯。

反對派堅持對抗國家執政黨的政治立場，鑑於香港社會主流民意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經濟講「一國」，不敢公然反對興建連接香港與內地的大型基建項目，卻一再骨頭中挑刺，使用種種藉口，例如環境保護或保育，來設置障礙。

政府應竭力創佳績

毋需諱言，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依然認同西方價值觀，給了反對派反對或阻撓香港發展、尤其反對或阻撓香港與內地拓展聯繫以可趁之機。

無論阻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撥款和建造還是阻撓港珠澳大橋香港部分動工興建，都有一些為反對派所煽動而走上街頭或訴諸法庭的香港居民。他們不屬於反對派政治團體，他們或者是出於固守香港本地意識的心態，或者是出於對香港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恐懼，是屬於思想領域的問題。

特區政府承繼「九七」前的思維和工作習慣，項目可行性研究和規劃遵循既定程序或規範，是否有改進或提速的餘地，需要特區政府行政部門來總結。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在決定政策和執行政策方面的缺失，以及香港社會矛盾激化，給香港發展製造了不可低估的困難。例如，反對撥款669億港元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其中一個理由是，這筆鉅款應用來解決愈益惡化的民生問題。換言之，倘若特區政府改善民生能有可觀成績，那麼，反對派就少了一項煽動群眾反對或阻撓有關工程的藉口。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提升話語權

日前，胡錦濤總書記就中國文化建設方向問題在《求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文章。胡錦濤在文章中不僅強調了文化「軟實力」之於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性，而且更對「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之現實挑戰給予了密切關注；由於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緊密相連，而在「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的情況下，胡錦濤文章中所提出了戰略發展方向，無疑切中要點，並因此而贏得了廣大中國網民發自內心的支持性熱議。

西媒控制國際話語權

由於文化「軟實力」的話題廣泛，並非一篇短文所能涵蓋，所以，筆者打算以相對具體的國際話語權話題展開多探討；或者更具體點說，「中國聲音」是否存在某種缺失呢？

西媒的囂張是源自其對國際話語權的有力掌控。由此也就構成了一個重大問題，那是：西媒緣何能夠全面掌控國際話語權呢？不錯，西方經濟發達，傳媒先進，其更容易贏得世界各地受眾的認同和接受，這也是歷史傳承的必然結果。但在確認這一現實的同時，人們卻似乎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國也曾享有的國際話權。

在中國的經濟狀況處於極端困難的「文革」時期，中國聲音卻總能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並獲得相當時的歡迎和支持，甚至連現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年輕時還曾經是「毛主義」的堅定信奉者；而到了中國經濟實力已經大幅提升而傳媒條件更能與西方世界並駕齊驅的優異環境下，緣何世界各國只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完全無視中國的政治立場呢？事實上，很多國家總因為西媒對中國的貶損而開始熱烈討論的事實，則已然顯示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嚴重遺失。試想，連基本的國際話語權都不擁有，中國又如何開創文化「軟實力」？

事態如此尷尬，其根本原因恐怕是緣於中國媒體的指導原則存在「短腿」所致。過去若干年來，除非西媒攻擊中國而促使中國媒體作出憤怒反應，而在不涉及中國利益的情況下，中國某些媒體及學者幾乎都是以西媒所傳遞的信息和表達的立場來作為自己判定世情的唯一標準；不論是曾經發生的伊朗大選的諸多爭議，還是頻繁發酵的其他問題，中國媒體採行西媒聲音不僅是不爭事實，恐怕更是普遍規律。這樣當中國好些媒體業已成為西媒傳聲筒之時，中國聲音又怎麼可能贏得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和接受呢？

讓「中國聲音」更受歡迎

需要強調，為維護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國媒體逐漸實施不再像過去那樣對時常對西方的政府政策和西媒聲音多作正常鞭笞的新指導原則，也確實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但問題是，中國媒體的友好表現會獲取相應回報嗎？國人必須意識到，當中國的飛速發展可能動搖西方世界的巍峨地位時，不論是其政府還是媒體，便總是根據最新事態而隨即作出表態表現，實際上是其戰略思考的真實反映；不論是過去的西藏和新疆問題，還是不停息的人民幣問題，抑或是可能發作的危害中國正常發展的突發事態，已然深切體現了西媒的這種表現。

我們無法改變西媒的基本思路，也同樣不可能讓他們放棄搞垮中國的目標，所以，我們完全不必因為西媒對中國的惡毒攻擊而放棄堅守自己的既有路向。但問題是，如果西媒對中國的污衊能夠獲得全球大多數受衆的認同而中國媒體的反擊卻缺乏應有的力度和效果，則至少有可能令中國在輿論戰中一敗塗地；事實上，其最終損耗並不局限於輿論戰。

正因為輿論戰在當今的國際競爭中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中國媒體可能確實需要對自己的運作路向作必要調整。其實，只要體察一下諸多西媒接連發生危害中國利益的嚴重事件卻並沒有令其國家政府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出現降溫之客觀現實，中國媒體也就應該能夠得出這樣一種認知，即國際間的輿論摩擦雖然會令雙方產生不快，但決不會從根本上破壞兩國的正常國家關係。如果中國媒體能夠部分恢復「毛主義」時代的運作路向，則不僅能夠對西媒構成威懾，同時更利催生全球絕大多數受衆能因此而對中國的主張表達支持。可以不誇張地說，如果中國聲音能夠像「中國製造」那樣受歡迎，中國發展就將更舒暢。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李卓人「義工專」欠公義

有話要說

日前，以工黨主席李卓人為榮譽會長的「天恩愛心義工隊」，被踢爆其部分義工原來是「會行會走」的，卻在街頭坐着輪椅募捐博同情。另有前員工爆料，哪些所謂「義工」大多數是綜援人士，他們其實是以日薪220元「聘請」回來的。該前員工稱，為大機構籌款往往是「落格」的好機會，「邊個唔掠水呀？我以前要親自推錢箱上去佢（某人）屋企，都有成幾百次啦，你話推上去做乜？」他更親身示範偷錢伎倆。

過往籌款投訴不少

據知，「天恩愛心義工隊」在過往三年曾涉及24宗無牌籌款投訴、且曾被揭發擅錢箱而遭仁濟醫院終止合作，而其前主席何立生更於07年因被揭發吸冰毒，被法庭罰款5,000元。對於以上指控，天恩負責人將所有責任推卸在前任主席，而身為榮譽會長的李卓人更是天恩「樹大招風」。

李卓人的回應令人不寒而慄，若然他說「樹大有枯枝」還勉強可以推託，如今他卻說「樹大招風」，則明顯想隱瞞事實，他沒有正視問題，甚至有姑息養奸之嫌。據仁濟醫院發言人指出，「天恩愛心義工隊」於06年會協助他們的「慈善雙周」活動，籌得13萬元，事後發現該義工隊的籌款錢箱有明顯被破壞痕迹，且箱中紙幣排列得異常整齊，故仁濟方面至今已無再與該義工隊合作，「將來亦不會」。若然「天恩愛心義工隊」是信得過，所以仁濟才「敬而遠之」吧。

「榮譽會長」不清不楚

□希爾爾

事實告訴我們，仁濟「怒炒」天恩是鐵一般的事實，「天恩愛心義工隊」並不是樹大招風，而是榮譽會長李卓人「亂發喚風」，究竟他為什麼要隱瞞事實呢？他是否亦有牽涉上利益關係呢？這些都是大眾關注的事情。想不到，本已在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罔顧工人利益而招致聲名狼藉的李卓人，如今率領的義工團隊亦如此不濟、「唔清唔楚」，令人滿心懷疑，李卓人這個榮譽會長的所謂「榮譽」可謂一鋪清袋，不值一哂。

照一般理解，義工是參與義務工作的人，皆是有愛心的，但以李卓人為首的「天恩愛心義工隊」的義工隊則與別不同，不單涉嫌領取薪酬，兼且「會行會走」還坐着輪椅無牌籌款博取街坊同情「捐多些」，有些更積極地「跨區工作」，這些全都是「不義」的事，亦有違常理，做善事是隨緣樂助，做義工亦是隨心而發的，若果市民選擇當義工，他們會願意被勾結做這些「不義之事」嗎？

市民長期被蒙鼓裡

若果沒有善事以外的巨大誘因，「義工」們怎會「沒跛扮跛」鏡而走險，違心、違法地參與「街頭騙案」？「天恩愛心義工隊」的部分「義工」，以「義工」之名行不義之事，已經大大偏離做善事的原意。若然某些綜援人士在天恩當「義工」卻領取着薪酬，當局更有必要跟進事件。

以工黨主席李卓人為榮譽會長的「天恩愛心義工隊」，先有受薪「義工」擅錢箱偷錢、前主席吸冰被捕、被仁濟「怒炒」等紀錄，後又一些涉嫌「沒跛扮跛」的所謂「傷殘義工」在街上招搖撞騙「擺明搵笨」，市民必須要分外小心，而當局更應該密切關注事件，必要時檢查募捐者的真正身份，以免市民被蒙在鼓裡，招致損失。須知道，當義工欠缺公義，榮譽會長又欠缺榮譽的時候，市民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



割房賭居

黃牛

四千億設「全民養老基金」

□譚文天

議論風生

人皆有老。所以，在人文方面比較先進的社會，均有「長者日」或「老年日」之設，以示對高齡人士的關懷。香港每年都有一天定為「長者日」，去年是十一月二十日。這一天，既有慶祝，也有訴求。

因為「人皆有老」，延伸的結果就是：老有所依，老有所養。這也正是人類與動物的最大和最關鍵的區別之一。動物是沒有「養老」這回事的，即使是群居性的動物，也只有「撫幼」而沒有「養老」，當然更不可能有什麼養老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先進程度而言，判斷的尺度之一，也可以看有沒有養老制度，以及這一制度是否完善或完善到何等程度。

「老吾老」成大問題

二千三百年前的孟子，就已經指出人類社會有養老制度的需要和必要。孟子在《梁惠王上》一文中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語二千多年來已成為各朝各代君主、大臣、文化人和思想家的座右銘，且也是「明君」「名相」「名臣」的治國或管治方略之一。其實，何止是方略，更加是人性中善良一面的表現。

值得注意，「老吾老」與「幼吾幼」在實際生活中是有差別的。說句笑話：大概是「上帝造人」時在材料（據說是泥土）中加入了什麼特殊成分，所以，「撫幼」是普遍現象，嬰兒誕生後，端的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又有「可憐天下父母心」的俗語，但「養老」「安老」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若論世人對「撫幼」與「敬老」「養老」的態度差別，《紅樓夢》中跛足道人吟

唱的《好了歌》，就有極為真實和深刻的描述，那就是：「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慨乎言之，社會不但要致力「撫幼」，更加要努力「養老」。

但看香港的現實情況，「幼吾幼」不算問題，「老吾老」大成問題。孟子的眼光看透了人類本性，且遠矚幾千年，他的上述金句將「老吾老」放在「幼吾幼」之前，就說明「養老」事務更值得君王和社會的關注。孟子的洞察力之深，真的是「不到你不服」。

香港是富裕社會。論人均收入或人均GDP，香港都是世界一流。只可惜，香港的「養老」問題，大概在富裕社會中是世界九流，甚至是世界末流。第一，在富裕社會中，香港是世上唯一沒有退休保障機制的地方，即香港並無全民養老金之設。第二，香港人老了，退休了，年滿六十五歲，經過申請，每月可獲得一千零三十五元的「生果金」，正式名稱是「高齡津貼」。這一千大元，能讓長者過上有足夠尊嚴的基本生活嗎？答案是：不能，絕對不能！以香港的生活水平之高，每人每月沒有三千至三千五百元，那是難以過日子的，更不必說「好日子」了。

退休保障應變革

應該指出，自英治時期以來，香港一直沒有設立退休保障機制或全民養老金制度。香港回歸快五十年了，局面依然如此，不能不令人搖首嗟嘆。難道說，在敬老、安老、養老的問題上，回歸後的香港，在這方面仍要跟英治時期一樣「五十年不變」？須知，當年的「五十年不變」，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不變，絕非指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就事論事，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一定要變，從無變有，應盡快爭取「零的突破」。香港必須要有這一里程碑式的變革！

對此，政府會說「社會未有共識」云云，可能是有人誤導，令他對民情的了解出現很大的落差。假如八成市民支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機制

，這還不算「共識」，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共識」可言了。毫無疑問，弱勢長者及人到中年，處及退休的弱勢族群，對下屆行政長官必也有很高的期待。

從財政上看，香港此時此刻已完全有條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機制或全民養老金制度。

其一，香港有六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放眼世界，除了幾個產油國，很少有國家或地區能像香港這樣「水浸」庫房。

其二，香港有超過一萬七千億元的外匯基金。固然，本金不能隨便動用（九七回歸時為救市擊退國際大鱷動用過一次，用了一千多億元），但每年幾百億元的盈利，可拿出一部分用於全民養老金。

可整合庫房盈餘

其三，目前申領生果金的長者約五十三萬三千人，是項開支每年約六十六億三千萬元，假定全民養老金設為三千元（同時取消生果金），則每年財政支出增加一百三十二億六千萬元；假定養老金設為三千五百元，開支增加一百六十五億七千五百萬元，這對擁有極佳財政條件及年年有財政盈餘的庫房，可說是「小菜一碟」。

其四，政府可從龐大的外匯基金和財政儲備中，各撥出一部分，例如外匯基金撥三千億元，財政儲備撥一千億元，組合成共四千億元的「香港全民養老基金」，交由金融管理局管理，其投資收益用於全民退休保障。假如回報率百分之五（這已是較低標準），每年收益二百億元，加上原有的生果金款項，即使考量時加入人口老化的因素，相信未來十年的全民養老金都不成問題。

孟子「老吾老」名言的最後一句是「天下可運於掌」。香港若解決了「養老」問題，五十多萬長者及其家屬約二百萬人，從此放下「養老」的「心頭大石」，任何人出任行政長官都是「天下可運於掌」矣。